责任编辑 顾 玮 电子信箱/gw@cnnb.com.cn

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
B1-B4
四明周刊

报告文学

热土忠魂

王存政

立冬以后，四明山区最耀眼的色彩是红色。

一棵棵、一丛丛、一排排枫树、三角槭、乌桕、池杉的叶子红了，橙红、玫红、赭红、朱红，远远近近，在一片一片绿色、黄色、铁色的树木中，鲜艳夺目。

1

瞻仰过位于余姚市梁弄镇狮子山巅的四明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时间尚早，我在园区内慢慢地走、慢慢地看。

不经意间，看到主路台阶旁，竖着一块“先辈纪念林”指路牌。

先辈纪念林？怀着好奇，我按照路牌所指，走进这条小路的深处。

两百米外，一道砖墙，两扇门，黑石门框两侧是一副楹联：“革命先辈魂归四明日月同光，红色大旗风靡浙东众人共仰。”

推门进去，猝不及防，眼前是一座、两座……八座、九座……十几座、几十座陵墓，青石凛凛，松柏森森。

谭启龙、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刘享云、连柏生、张文碧……一个名字、一个名字……马青、黄志裕、王起、刘发清、黄士生、黄明、徐英、陈洪、陈布衣……一座陵墓、一座陵墓，慢慢地走，慢慢地看。这些名字，有的，我熟悉，也有的，完全陌生。我缓行在这些名字之间，缓行在这块当地人称作“落地梅花岗”的地方。没有风，周围也没有一点声音，我屏住呼吸，一一细看每方墓碑上介绍逝者生平的文字。

没有想到，我于偶然之间，来到了一方圣地。

2

浙东四明山，绵延八百里。之前，我曾经读到过一些资料，讲述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故事。

1941年2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不久，党中央致电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4月再次致电强调：“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大有发展前途)。”

1941年5月，50余人的浦东部队先遣队，南渡杭州湾；6月16日，浦东后续部队130余人南渡浙东。两天后的6月18日，即在余姚北部的相公殿打了一场伏击战，我军首战告捷，为胜利开展浙东抗日游击战争打响了第一枪。

1942年9月，中共浙东区委提出“坚持三山、开辟四明”的方针，谭启龙、何克希等率领浙东区党委和游击纵队指战员挺进四明山。1943年4月，攻占位于四明山腹地的余姚梁弄后，浙东区党委、游击纵队司令部迁至梁弄镇和附近的横坎头村，这块根据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我党领导的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5月第一批浦东武装南渡三北至1945年8月底，浙东游击纵队在各地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作战643次，毙伤及俘获日伪官兵近万名，解放同胞400万人。在打击敌人的同时，浙东游击纵队也得到发展壮大，由当初从浦东先后南渡到浙东时的900多人，北撤时已发展到1.5万人。

1945年10月，浙东新四军奉命北撤后，留下少数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员坚持斗争，直至1949年5月余姚解放。浙东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在这一时期，先后有980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1800多名指战员英勇负伤。

这是一段抗争御侮、共赴国难的征程，战火熊熊燃烧，鲜血汩汩流淌。

四明山，有多少进步青年向着这里的正义和旗帜而来；四明山，又是多少老战士几十年来魂牵梦萦的地方。这里，激荡着他们抗日救国的革命理想，烙印下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穿行的身影。新中国成立了，老战士如种子般遍洒天涯，但是，一旦有机会，他们或者独自、或者相约而来，回到这片深深眷恋、深深感恩的热土。

3

1982年12月17日，何克希同志因患心脏病不幸在杭州逝世。12月30日，遵照他的遗嘱，何克希同志的夫人陈孟庸带着子女们，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四明湖畔。

何克希，这位原浙东游击纵队的司令员，成为走出浙东战场、多年在外地工作、逝世后魂归四明山战地的领队人。

1906年1月20日，何克希出生于四川省峨眉县绥山镇，在中学读书时，就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忠县、成都、雅安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组织武装暴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江苏江阴参与组建抗日武装，先后任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总指挥、新四军第六师副参谋长等职。1942年7月，由新四军军长陈毅建议并经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何克希前往浙东与谭启龙会合，成立浙东区党委，任中共浙东区委委员、军事部部长，并一直担任三北(镇海、慈溪、余姚三县北部)游击司令部司令和以后改名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

1945年10月，何克希率领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到苏北和山东后，先后担任华野一纵队三旅政委、一纵队副司令员兼二师师长、三十五军政委，在华东战场上亲历并参与指挥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淮海以及渡江等历次重大战役。在我军进入南京前，三十五军在何克希的指挥下，以一个师的兵力率先渡过长江，把红旗插上了伪总统府。

新中国成立后，何克希历任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委、华东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军事学院装甲兵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国家决定成立专门机构研制原子武器，何克希主动要求转业，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任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他上高原、涉瀚海，遍访大西北，勘察核燃料生产基地，为我国原子武器和核工业的开拓试验及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66年花甲之年，他调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直至逝世。

陈孟庸老人多次谈起，何克希回归四明山的想法由来已久。

1945年10月，浙东游击纵队奉命横渡杭州湾北撤，开赴苏北。国民党军调集七个团的兵力，控制了海盐县澉浦镇周围的山头，准备围歼北撤部队于澉浦海滩。10月4日拂晓，何克希率领1200余人从余姚北部渡江，陆续在澉浦东门登陆。当何克希等人正在查看地形时，国民党军突然向他们发起了袭击。何克希组织部队坚决还击，经过10多个小时激战，终于突破重围，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阴谋。

这次战斗，浙东游击纵队北撤部队有100多人牺牲。这100多人，大多为浙江、江苏、上海籍人。有的，昨天才离开老家，有的，即将回到故乡，可是，朝夕之间，血洒疆场……每当回想起这一段时，何克希万分痛心，这些战士，一个个，就在他的眼前倒下，他们，都是跟着自己刚刚从四明山转移出来的亲人兄弟啊！

在泰山万仙楼北面，高耸着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708位在山东作战牺牲人员的名字，他们都是何克希担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三旅政委时的部下。这支部队，由浙东游击纵队沿革而来。新中国成立后，何克希专门协调落实建起这座纪念碑。他说：“我带出来的人，带不回去了。我不能忘记他们。”

陈孟庸老人说，已经有好些年了，何克希一直郑重地表示，百年之后要回四明山，与革命老区、与战友、与四明山的人民永远在一起。

何克希的儿子何晓东回忆，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1982年12月30日，母亲陈孟庸带着他们兄弟姊妹从杭州来到梁弄。那一日，天阴沉沉的，特别寒冷，当他们在四明湖畔撒下父亲的骨灰之后，天晴了，在阳光的照耀下，湖水闪着银光、金光。父亲一定是欣慰的，他可以安息了，他融入了永远难舍难离的这方山水天地。

生命各有血脉，英雄自有来处。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首歌，何克希会唱，陈孟庸老人会唱，他们的子女也会唱。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有比钢铁还硬的骨头和意志，他们更有高远的理想、深沉的热爱。

1983年，梁弄镇党委、镇政府在落地梅花岗征地三亩，建设纪念林，同时树起了一座纪念碑，碑上镌刻着由老红军战士、著名书法家舒同题写的七个大字——

“何克希同志千古。”

4

沙场驰骋，志士慷慨；薪火相传，忠魂在怀。

继何克希同志之后，1989年4月，曾经担任浙东行政公署主任、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的马青同志在南昌病逝。马青是绍兴柯桥人，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浙江省、国家粮食部、江西省等多个机关单位工作。根据他生前遗愿，他的骨灰撒于四明山。

又之后，曾经担任浙东区党委委员、党委组织部长的杨思一同志，迁葬四明山。杨思一是诸暨城关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省纪检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省委常委，副省长。1957年12月，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同月20日病逝于杭州。1979年6月，经中央批准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彻底平反。

又之后，1992年3月，曾经担任三北游击司令部副司令、浙东政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浙东行政公署主任的连柏生同志在成都病逝。他生前遗言重返四明山。连柏生是江苏南江县祝桥镇人（今属上海），抗日战争初期，他和同乡有志青年一起创建了一支抗日武装。后来，根据党的指示，他所指挥的浦东队伍分批转战浙东。新中国成立后，连柏生曾任辽宁省政府代理党组副书记，辽宁省民政、教育、财政、建设厅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公路工程总队总队长，国家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四川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又之后，1992年4月，曾经担任浙东游击纵队参谋长的刘享云同志在杭州逝世。刘享云是江西贵溪人，1929年参加红军。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在江西、浙江打游击。1942年6月，在新四军主力部队任团参谋长的刘享云调任浙东游击纵队参谋长。战争年代，刘享云曾多次在执行任务时身负重伤，与组织失去联系，但是，每一次他都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找到部队。新中国成立后，刘享云曾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在医院治疗期间，他多次表达意愿，希望身后能回到四明山。

又之后，1993年7月，曾经担任浙东区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长的顾德欢同志在北京逝世。顾德欢是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7月，从浦东带部队到浙东游击纵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中科院党组成员、顾问等职。临终前，顾德欢同志留下遗嘱，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火化归葬四明山。

又之后，2003年1月，曾经担任浙东区党委书记的谭启龙在浙南逝世。谭启龙1913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黄塘村。革命征程千万里，最终，他选择安息在四明山根据地。(关于谭启龙，将在后面专门作一段叙述。)

又之后，2008年10月，曾经担任浙东区党委委员、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的张文碧同志在南京逝世。张文碧是江西吉水人，他于1930年参加红军，先后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师特派员、挺进师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张文碧由新四军第一师南通警卫团政治委员调任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志愿军军政治部主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张文碧临终前委托家人，代他向党组织缴上特殊党费，并嘱咐：“……不搞告别仪式，不惊动老战友、老部下、老乡亲。送我到四明山去……”

至此，于1942年7月28日在三北宓家埭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浙东区委员会四位班子成员：书记谭启龙，委员、军事部长何克希，委员、组织部长杨思一，委员、宣传部长顾德欢；为统一领导抗日武装而于1942年8月12日在三北金仙寺组建的“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1943年12月22日改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五位领导成员：司令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副司令连柏生、参谋长刘享云、政治部主任张文碧，全部魂归四明山。

有研究党史的专家介绍：同一块根据地、同一时期的党委班子、军事指挥班子成员，去世后全部回到当年浴血奋战的地方，唯此四明山。

这些可敬的老战士，曾经，他们以“誓与山河共存亡”的坚定决心，“愿拼热血卫吾华”的不屈意志，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而今，老兵老去，但是，他们不改初心，一个跟着一个，又回到了曾经燃烧熊熊篝火，突进于丛林壑墜、用毕生力量托举起信念旗帜的地方；一个跟着一个，化作沉默的石碑，肃立在这块热土之上。

5

这些老人，出生地不同，为什么离世后不去所在地方公墓？为什么不回故乡？当然可以说，是因为他们拥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有对青年时代激情燃烧岁月和生死与共的战友的怀念……可是，相对于漫漫人生，四明山时期毕竟只是并不算长的一段。何况，当年他们提着命跟日伪、顽军打仗拼刺刀，冬天顶严寒，夏天抗酷暑，条件艰苦到难以想象……新中国成立了，他们都进了城，都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有时间了，过来走走看看，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为什么却要叶落归根于四明山呢？

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所思所想。这里，每一块墓碑、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长长的、说不完的故事。

四明山脉七十二峰，一座连着一座的山峰静默着，一棵挨着一棵的树木静默着，一株挨着一株的小草静默着……无边的静默，正可以让我们思考得更多。

6

置身于这片静默的碑林中，我却仿佛听到了杂沓匆促的脚步声，我的眼前，正行进着一支跋涉向前的队伍……

这支队伍，有一位领军的好班长、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

1928年3月，15岁的谭启龙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担任共青团江西永新县西北特区书记。再后来，中央红军长征，谭启龙留在了苏区。经历了1934年秋至1937年冬的三年游击战争，谭启龙追随陈毅、粟裕，奇迹般地活了下来。1938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苏皖区党委书记、皖南区特委书记，1942年7月起，任浙东区党委书记。1945年10月北撤后，谭启龙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谭启龙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60年代，担任过山东省委第一书记；70年代，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3月至1982年12月，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党中央提出领导干部年轻化的要求后，他主动申请“退下来”，邓小平同志为他亲笔题词“人间重晚晴”。

谭启龙一生中曾三度在浙江战斗和工作：

——1942年7月，受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委派，谭启龙率部挺进远离老根据地、孤悬敌后的浙东一带。抗战胜利后，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谭启龙奉命带领浙东新四军主力北撤。

——1949年5月，谭启龙参加解放浙江的战斗后，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领导浙江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开展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经营。

——1972年4月，谭启龙从福建调任浙江省委书记(主持工作)，接着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等职，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努力消除“文革”对浙江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进行了不懈努力……

是的，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谭启龙同志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为党、为人民奉献了一生，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

2003年1月22日，谭启龙因病在济南去世。根据他的遗愿，他回到了四明山。他和老战友们，生生世世，集结在四明山根据地。

关河梦里何处？霜风劲，征程险。青山绿水浩然归，烽火当年四明山。

7

站在落地梅花岗上，我心潮起伏，不愿意离开。

当年的战士，多数已经远离我们而去；很少部分还在世，即便年纪最小的，行动也已经不再利落，原先明亮的眼睛，也已经混浊……可是他们的心里，永远都牵挂着这块红色的土地。

2018年6月20日上午，“四明山妈妈”雕像揭幕仪式在余姚市陆埠镇裘岙村举行。这座花岗石雕像的主角，是一位怀抱婴儿、眼神中满是慈爱和坚定的年轻妈妈。雕像的原型名叫翁大芝。

1945年10月，谭启龙与妻子严永洁紧急北撤，当时，他们的儿子谭大凯刚出生两个多月。如果带着孩子撤离，前路迢迢怕照顾不周。如果留下，反动派一定不会放过襁褓中的孩子。正当谭启龙夫妇犯愁时，裘岙村媳妇翁大花主动站了出来：“我愿意跟随部队北撤，照顾你们的孩子。”翁大花的想法很简单：新四军解放四明山，山里的人民翻了身，我应该报答他们。

一开始，谭启龙没有推准她的请求。一方面，翁大花的儿子裘明星也只有4个月大；另一方面，队伍开拔，不知何时是归期。

但是，翁大花心意已决。第二天一早，部队出发，翁大花的丈夫裘光主把熟睡的裘明星放入谷箩，把谭大凯放到另一个谷箩里，挑着两个孩子走到了上虞。分别的时刻到了，裘光主把裘明星带回四明山，翁大花则抱着谭大凯，一路北上。

离开家乡后，翁大花参了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后来，噩耗传来，翁大花于1947年牺牲在山东沂蒙山区。

谭大凯的哥哥谭大骏，随部队北上时已经4岁了，他对大花妈妈更有印象。谭大骏回忆，长途行军中，他和弟弟谭大凯两个人分别被放在两个筐里，由一匹骡子驮着。在筐里窝久了，谭大骏会把身子探出筐外。每次探身，都能看到大花妈妈的背影。牵着骡子，带着两个孩子，翁大花从四明山一路走到沂蒙山。谭大骏深情地说，这个背影，一辈子都不会忘。

裘明星说，新中国刚成立时，谭启龙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曾经把他和父亲接去杭州。但是，毕竟是劳作惯了的山里人，不习惯城市生活，不久又回到了四明山。

1992年7月，浙东区党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时，谭启龙带着谭大凯回到裘岙村。他拉着谭大凯和裘明星两人的手说：“大凯，你是吃四明山妈妈的奶长大的，你不能忘了四明山人民。裘岙村里有你的兄弟裘明星，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谭启龙去世后，裘明星到陵墓前送了花圈，落款是“儿子裘明星敬挽”。

红色四明山，军民一家亲。像这样的故事，有许多许多——

张文碧的妻子王唯到三北不久，生下儿子张溪，因为缺乏营养没有奶水，就交给当地的大嫂奶养。2005年9月，张溪回三北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时，激动地说：“我是吃三北大嫂的奶长大的。父母给我取名张溪，就是叫我记住，是慈溪人民养育了我。”

邱子华烈士是福建上杭人，1932年参加红军。1944年9月，他调任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勤妇科科长。1945年2月22日，在上虞反击日伪军的作战中英勇牺牲。

邱子华的灵柩下葬于梁弄后杨岙村的山坡上。1945年10月，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为了保护邱子华的坟墓不被敌人破坏，后杨岙村民深夜将他的墓碑秘密转移，覆土珍藏。新中国成立后，老区人民又在墓地原址重新竖起了烈士墓碑。

这块墓碑上，刻着何克希司令员的题字：“一个忠诚于革命与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历经74年，字迹仍然清晰如昨。

1945年10月部队北撤时，邱子华的女儿曹肖华才一岁多，母亲曹炎要跟着部队出发，只好送给担任党支部书记、民主乡长的梁辉的妈妈抚养。1949年底，曹炎随部队回到上海安定下来，才把曹肖华接走。

曹肖华常去余姚邱家湾看望四明山奶奶，同奶奶住一个屋，睡一张床，直到1974年5月奶奶去世。

而早在1948年11月3日，时任中共姚虞县工委委员、梁弄区委书记的梁辉执行任务途经箬岙村时，遭敌伏击。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壮烈牺牲，年仅27岁。

2005年9月，在宁波市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红色记忆)歌会上，一边，曹肖华讲述着老区人民保护烈士墓碑、抚养烈士遗孤的故事；一边，新四军老战士和唱着那首名为《父老乡亲》的歌：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啊，父老乡亲，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

8

余姚，梁弄，狮子山，落地梅花岗。

松柏森森，青石凛凛。

一座陵墓、一座陵墓、一块墓碑、一块墓碑，一个名字、一个名字……

每一块墓碑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位忠诚坚定的共产党人，都是这方热土之子，都是肃穆的、庄严的，都是肃穆的、庄严的！

它们坚守着信仰，承载着记忆，闪耀着光芒。

已是隆冬时节，几经寒风冷雨，那一棵棵、一丛丛、一排排枫树、三角槭、乌桕、池杉，却依然铁杆铜枝，矗立于苍茫。

是的，四明山区最耀眼的色彩是红色。今天，四明山早已是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但是，她的底色永远是撼人心魄的红色——日日，月月，年年，殷红、鲜红、火红、赤红！